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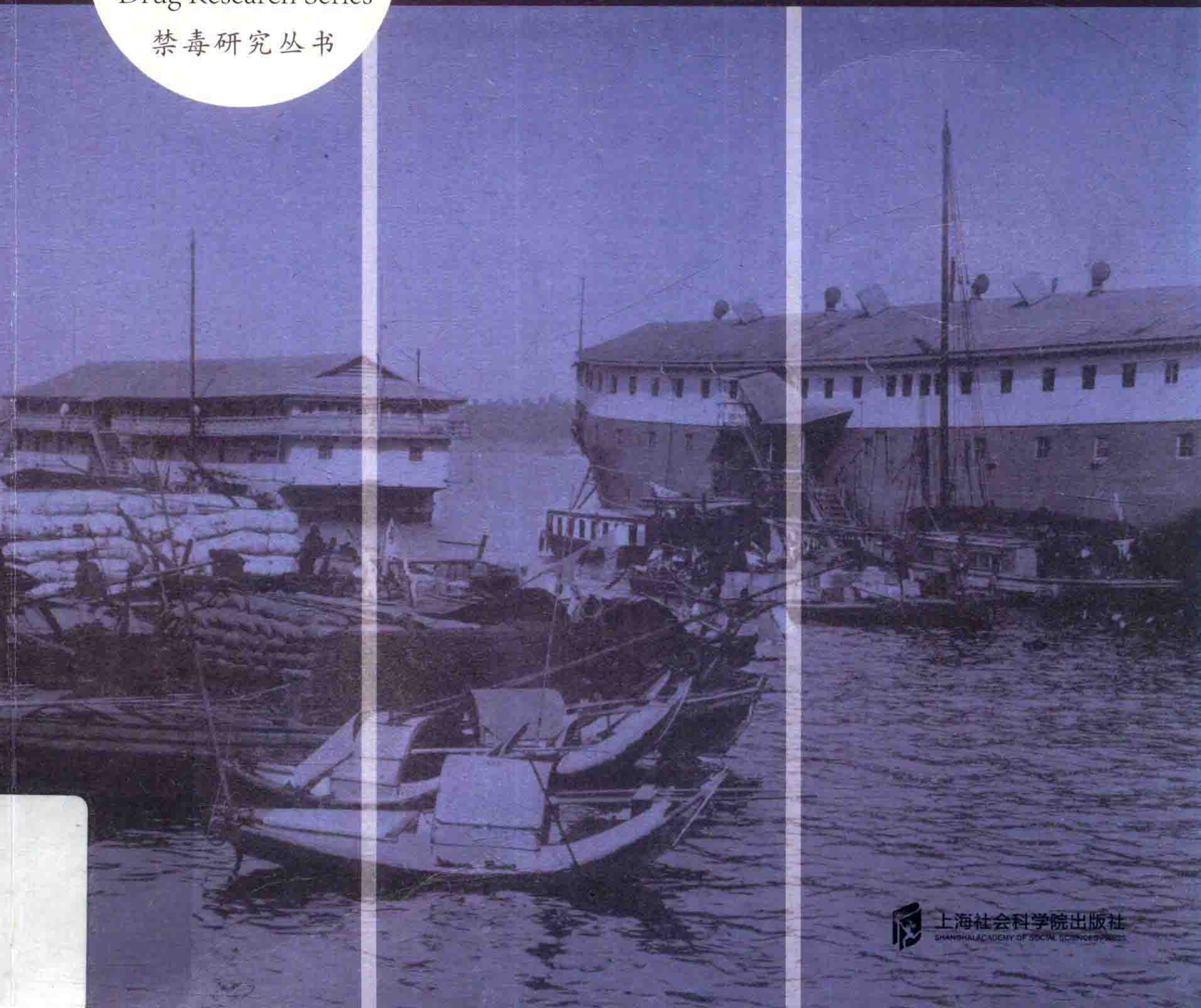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苏智良 著

中国毒品史

Drug Research Series

禁毒研究丛书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Drug Research Series

禁毒研究丛书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苏智良 著

中国毒品史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毒品史/苏智良著.—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2017

(禁毒研究)

ISBN 978-7-5520-1633-8

I. ①中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禁毒—历史—中国
IV. ①D669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76796 号

中国毒品史

著 者: 苏智良

责任编辑: 唐云松 袁钰超

封面设计: 夏艺堂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

电话总机 021-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-53063735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 sassp@sass.org.cn

排 版: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 刷: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×1010 毫米 1/16 开

印 张: 28

插 页: 1

字 数: 498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0-1633-8/D·414

定价: 8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毒品的出现和发展,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密不可分。

在漫长而寂寞的古代、中世纪,后来被判定为毒品的鸦片、大麻等东西,都曾为人类的繁衍、进化、生活提供过帮助;古柯也曾为印第安人创造无比灿烂的文化与建筑助过一臂之力。而由罂粟汁熬成的鸦片,作为良药的历史比作为毒品的历史要长得多。即使是后来人们谈虎色变的吗啡,也是至今为止,人类最能信赖的镇痛药物。

但是,人类由发现鸦片的止痛疗疾作用而进一步享用成瘾后,便自尝恶果了。

尤其是在中国。

近代中国思想家魏源曾指出:“鸦片流毒,为中国三千年史未有之祸。”^①的确,在中国悠久、璀璨的文明史上,没有第二种商品像鸦片那样,震撼过这个古老的中央帝国的根基,并给她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与耻辱。“东亚病夫”这个屈辱的称号,正是鸦片在近代中国泛滥之后,西方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。

一、毒品在中国

中国的鸦片与罂粟,都是在唐初由阿拉伯商人朝贡献给中国皇帝而逐渐流传开来的。那时的中国,正是铁马金戈、国威远播的盛世。在阿拉伯世界被视为圣品的“底也伽”,到了物产丰盈、珍品云集的盛唐,似乎并没有掀起任何波澜,它只是为体系博大而内涵深邃的中华药库增添了一味良药,仅此而已。由唐至明的600余年间,罂粟与鸦片的药理与作用,被历代名医日益认识并逐渐推广。

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八方来朝、国力强盛的封建帝国,四野的朝贡、奇珍的献纳,再加上太平盛世的观念,宫廷中弥漫着奢侈、纵欲的风气,鸦片正是在

^① 魏源:《海国图志》,卷三十七。

这种追求享乐的氛围里成了贵族们热衷的“神品”，连皇帝也莫能例外。从此，吃鸦片由贵族而民间、由宫廷而四野，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吃鸦片的阶层。

清中叶后，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确立向中国倾销鸦片的政策，也由于吸食法的东渐，烟毒日炽，吸食者增加到 200 万人。中英之间关于鸦片贸易的矛盾与冲突，终于酿成了 1840 年的鸦片战争。随着中国的失败，鸦片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，被称为“洋烟”的外国鸦片在 19 世纪 80 年代达到了最高潮。

与此同时，罂粟种植与土烟生产在中国士大夫们“稍分洋烟之利”的口号下而剧增猛长。到 20 世纪初叶，在多难的中国近代史上，又添上了几个苦涩的纪录：罂粟种植最广，鸦片产量最多，吸毒人口最众。尤其严重的是，鸦片与吸毒并非仅是一般的社会问题，它是西方与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纠结点，也是清朝财政的重要来源，它深刻而全面地侵入社会的肌体，影响着中国的政治、军事与经济，也与千百万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到了民国时期，因政令不一，中央和地方的军阀为扩大地盘，纵容并鼓励种植罂粟，毒害民众，以至百业凋敝，田土荒芜，民不聊生。据笔者的研究，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，中国的烟祸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：罂粟种植面积为 8 000 万亩，鸦片总产量达 6 万吨，为各国鸦片产量的 10 倍，而吸食各类毒品者达 8 000 万人。

问题还不仅如此。在那个时代里，毒品成了市场流通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商品之一，毒品与黄金同价，鸦片可充当一般等价物，烟土被称为“黑粮”；吸毒成为全民族 16.8% 人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，50% 以上的中国人的生计、生活不同程度地依赖毒品，而五花八门的烟税更是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，各种政治势力为争夺罂粟种植地、鸦片运输通道和烟税而连年混战；在百年近代史上，毒品的影响力渗透到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、民众生活等社会各个领域和官僚、士兵、商人、知识分子、学生、农民、城市劳动者等社会各阶层。毒品几乎无处不在，无时不有，它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肌体上的一个毒瘤。

二、毒品与帝国主义

毒品在中国的流毒，与外国帝国主义密不可分。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毒品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。

鸦片是西方列强打开中国中世纪大门的敲门砖。18 世纪末，英国为了平衡三角贸易，违反人道，向中国走私鸦片，由此导致中国烟患泛滥。自 1800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确立鸦片政策到 1839 年鸦片战争爆发前，以英因为主的殖民者共向中国输入 638 119 箱鸦片，掠夺了 6 亿多银元；到 1917 年英国名义上停止对华输出鸦片止，外国共向中国推销、走私的鸦片、吗啡、海洛因和红丸等毒品，折合

鸦片共约 7 023 119 箱,由此从中国掠走了价值 6 616 345 219 银元。这数量如同天文数字般的鸦片,不仅毒害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,还从中国夺走了远比商业利润、战争赔款多得多的财富。

前期以英国推销鸦片为主,到民国时期,日本已取代英国成为向中国输入毒品最多的国家,而且多走私烈性毒品。自甲午战争以后,日本先是在台湾实行鸦片专卖政策,继又向大陆走私吗啡、红丸、海洛因。为此,日本在国内种植罂粟,如和歌山县每年生产 11 吨鸦片;以后,又在朝鲜的京畿、江原、咸南和咸北等地勒种罂粟。从本土到殖民地,日本帝国主义构筑成世界最大的毒品王国。尤其是发动侵华战争后,毒品便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征服中国人民的武器,在东北、内蒙古各地,日军和伪政权逼使农民大量种植“杨贵妃”——罂粟。宏济善堂成为垄断毒品交易的机构,在日军占领区,土行烟馆充斥城乡各处,“中国人经营的各种鸦片店,为了对付可能蒙受的困难,每天出 2—3 日元,至少雇用 1—2 名日本人或朝鲜人保镖。这样,这些店就被赋予了悬挂日本国旗的权力”,以至于出现了一些中国的瘾君子以为日本国旗是鸦片商标的笑话。^① 据统计,在日军占领区内,鸦片产量达 2 万吨,至少有 3 200 万中国人吸食各类毒品。

这一痛苦、耻辱、灾难般的历史,中国人是永远不应该忘记的。

三、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禁烟运动

自毒品在中国泛滥成灾后,禁烟便成了中国政府治政的中心任务之一。1729 年,雍正皇帝颁布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禁烟法令。从此,禁烟之声缕缕不绝。1839 年,在道光皇帝的推举信任之下,林则徐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禁烟运动。以虎门销烟为代表的禁烟壮举,有力打击了外国殖民者的贩毒行动,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坚定的禁烟决心,这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禁毒运动。

清末民初,中国政府又发动了第二次禁烟运动。这场运动分前后两期,前者是晚清新政的一部分,以挽救垂亡的政权;后者是民初政府除旧布新的措施,以巩固新生的制度:两者虽初衷不一,但却是一场社会改革运动的上下篇。这场运动前后十年,在民众的踊跃参与下,取得很大成果:罂粟种植锐减,烟馆大量封闭,吸毒者纷纷戒除,尤其是外交上,阻止了英国的印度鸦片的合法进口,在近代禁烟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但好景不长,自 1917 年军阀割据与混战后,毒祸再起。军阀们采取各种极

^① 江口圭一著,宋志勇译:《日中鸦片战争》,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,第 111—112 页。

其卑劣的手段,禁弛交替,只征不禁,遂使毒品更加泛滥。南京国民政府登台后,烟政几经变化,先是“寓禁于征”,实质也是征而不禁。1935年推出《六年禁烟计划》,分阶段禁烟,尽管各地阳奉阴违有之,但在步履姗姗之中,仍有些起色。到中日战起,已无暇顾及,毒卉再起,日占区更是烟雾重重。抗战胜利后不久,内战再开,国民党重心全在内战,对烟政既无心也无力,以至毒祸延续。1949年时,罂粟种植面积仍达2000万亩,吸毒者仍有2000万人。

自清中叶禁烟后,在长达220年的时间里,历届政府均高喊禁烟,中国不仅是发布禁烟令最早的国家,也是发布禁烟令最多的国家。但正是在形形色色、五花八门的禁烟令中,烟毒走向了泛滥,达到了高潮。毒祸屡禁不止的原因,概而言之主要是国家政治长期动荡,号令不一,各行其是;各级政府因贪图鸦片烟税而见利忘义,动摇于禁弛之间,政风腐败,官吏贪赃枉法,使禁烟徒有虚名;列强或凭借条约的庇护或武装干涉,大肆向中国走私毒品,破坏中国的禁烟。因此,尽管绵延百年的禁烟运动曲折悲壮,可歌可泣,但毒品问题一直没能根本解决。这项事关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任务,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。

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中央人民政府即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周密的部署,凭借对社会的有效控制、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廉洁高效的干部队伍,发动了第三次禁烟运动。仅仅用了三年时间,帮助千百万烟农改种作物,帮助2000万烟民脱瘾新生。危害中国百年的毒品问题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,1953年中国政府庄严宣布,中国已是一个“无毒国”。

四、毒品在近代中国蔓延及屡禁不止的原因

近代中国是世界上吸毒人口最多、毒品危害最烈的国家。以鸦片为例,其在中国流行之盛,传播之广,危害之烈,超过世界任何其他国家。那么,毒品为什么会在中国百年流行,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人吸食毒品的呢?

毫无疑问,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,是毒品普遍流行并长期泛滥的主要原因。这一点正如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1950年2月24日发布的《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》中指出的:“自帝国主义侵略我国,强迫输入鸦片,危害我国已有百余年。由于封建买办的官僚军阀的反动统治,及其荒淫无耻的腐烂生活,对于烟毒,不但不禁止,反而强迫种植,尤其在帝国主义侵略下,曾有计划地实行毒化中国,因此戕杀人民生命,损耗人民财产,不可胜数。”^①帝国主义——先是英国,继之日本,对中国倾销毒品,以及中国政府腐败无能,贪

^① 《禁毒工作手册》,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,第97页。

冤枉法,客观上造成中国毒品成灾。

笔者以为,除此之外,我们还需要从社会生活环境、民族精神等方面深入探析毒品屡禁不止的原因。今天,正在奔向现代化的中国人,需要跳出狭隘的文化视角,需要站得更高更远,透过历史的表象去思考,拨开历史的迷雾来反省。有无深刻的历史反省力,将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真正的前途。一个伟大的民族只有对她所经历的苦难和挫折、历史的阴暗面和社会的病态问题进行深刻反省之后,才可能战胜自身的弱点与惰性,从而超越自我,勇敢地走向未来、走向新的辉煌。

中国人追求享受的风气刺激了毒品的泛滥。清朝的中国存在着一个优裕的等闲阶层,他们借助毒品来享乐、纵欲。以鸦片为例,他们并不满足一般的一榻横陈,而是形成了“鸦片文化”。鸦片必要云南出产的麻栗坝精品,烟膏必是潮州帮调制的冷笼佳膏,还须掺入珍珠粉、野山参之类。连烟具也极其讲究,枪有宝石枪、虾须枪、象牙枪、沉香枪,灯有太原灯、琉璃灯、宝石灯。他们不仅把吸毒作为一种上等悠然的享受,作为浮糜生活的一方面,而且还是比官斗阔、显示等第的方式。媒人说媒,以日吸几钱烟膏为衡量家财的标准;遇红白喜事,以排出多少张烟榻为场面大小。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的国度里,统治阶层对毒品的追求,对下层社会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和导向作用。

客观上,鸦片比较适合东方人的性格与口味。与大麻类、可卡类毒品的兴奋作用截然不同,鸦片类毒品的特征是使激动得到镇定,让紧张变得放松,把分散加以集中,使人的心智达到无烦恼、无忧虑的解脱、宁静和平衡状态;仿佛可以远离人世的喧嚣、竞争、厮杀与骚动,进入一种无忧无虑的超脱境界。鸦片的这一特性与中国人的哲学与性格较为合拍。自古以来,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,老庄消极避世的思想可谓深入人心,庄周的梦蝶与鸦片所造成的意境,在社会功能上是十分吻合的。因此,许多中国人把鸦片烟膏当作了不可缺少的消遣物,可以不食白粮吃黑粮,除了它的成瘾性外,是因为鸦片能最大程度上满足避世、安静、自慰心理。

鸦片在晚清至民国这个衰世的流行与泛滥,还与中国所处的时代与地位有关。中国人自古以来信仰中华中心主义,数千年来,武威四布、疆域辽阔、物产丰盈,巩固了这种华夷思想。但鸦片战争后,中国一败再败于西方列强,接踵而至的割地赔款、丧权辱国,使国人陷入痛苦的深渊,但又寻不到摆脱落后的出路。于是,这种绝望、无奈的心态与鸦片一拍即合,整个统治阶级如鸵鸟般把一颗头颅埋入黑甜的鸦片里,让它来麻醉肉体,麻醉灵魂。

国民的贫困及素质低下也是毒品流行的原因之一。生活于底层的劳动人民,难得温饱,没有正当的娱乐活动来疏解生活的艰辛与痛苦,也缺乏来自社会的关心以慰藉苦难的心灵,于是,具有麻醉功能的毒品便成了下层民众寻求解脱

的佳方良药。在吗啡、鸦片、红丸的作用下,他们暂时忘却了饥馑的儿女、沉重的债务、贫困的耻辱、渺茫的前途。在这个意义上,毒品充当了物质化的宗教。不仅如此,在缺医少药的山区、农村,鸦片、吗啡是穷人能找到的价廉物美的唯一药品。毒品所具有的镇痛、麻醉、收敛的作用,对常见的各种疼痛、腹泻、咳嗽、创伤等有疗效,有的还效验明显。于是,对下层民众来说,鸦片之类便成了包医百病的救命良药。在许多地方,这成为下层民众吸毒的主要原因。而由于缺少科学知识,一旦成瘾,便不能自拔,从而受到贫困与毒瘾的双重煎熬。

五、近代外国鸦片入口的数量估计

自18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确立向东方输出鸦片的政策以后,中国日益沦为殖民者推销毒品的主要对象。要精确地计算出百余年间外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,是相当困难的工作。其原因不仅在于毒品运输的走私性质,使这项贸易的统计最零散最不全;还在于毒品贸易的复杂性。如进入东南亚的鸦片,经常通过民间渠道而运入中国,而中国进口的毒品也会再走私出国,凡此等等,给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。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,力图勾描出近代外国鸦片进口数量的变化(见图0-1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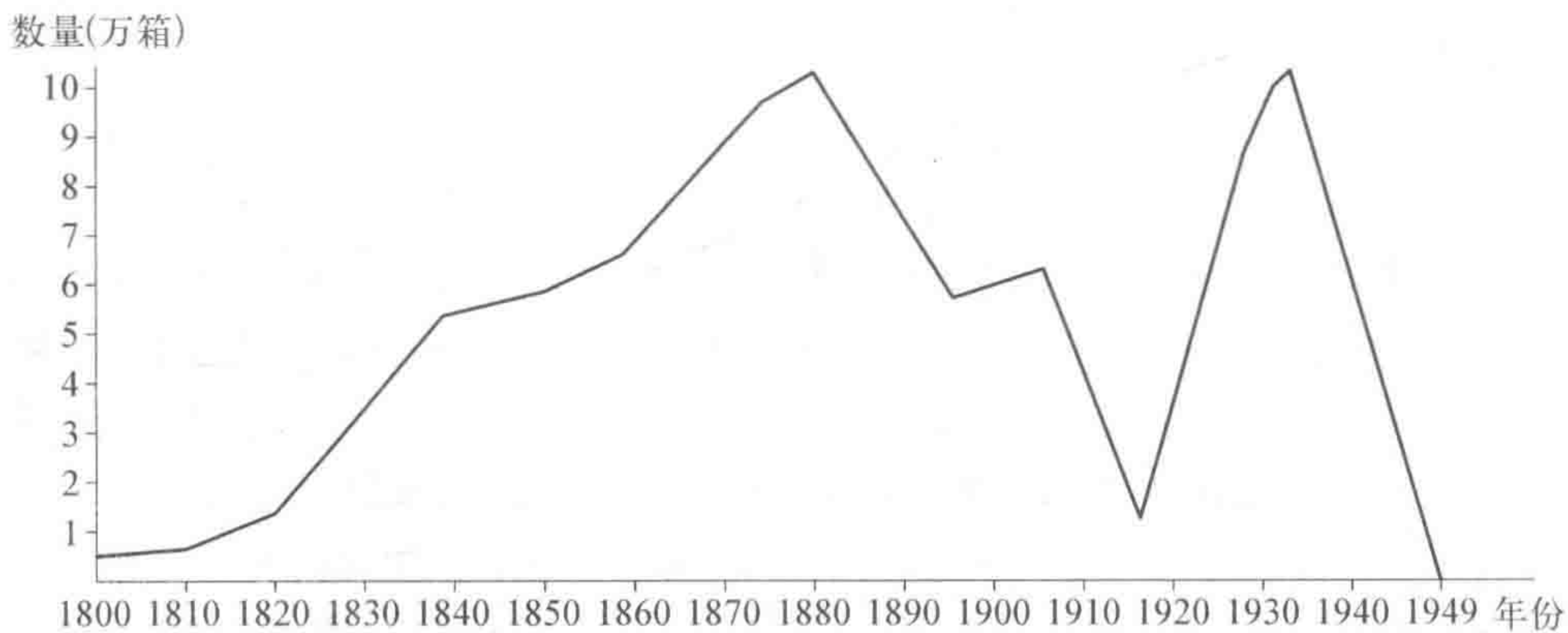


图0-1 外国鸦片及其他毒品输入中国的数量示意图

综合而言,从1800年到鸦片战争前夕,外国共向中国输入鸦片达638 119箱,价值6.01亿银元。战后,鸦片走私迅速得以恢复,并很快超过战前的数量。到1880年,印度鸦片的出口量达到10万箱,估计有80%以上流入中国,若加上波斯等其他国家的鸦片走私,输入中国的鸦片已接近10万箱。此后,输入中国的印度鸦片每年维持在5万—6万箱之间。1907年,在中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,英国被迫与清朝政府签订禁烟条约,每年递减一成,到1917年禁绝。但

到 20 世纪 20 年代后,中国军阀混战,毒品再度泛滥。外国的毒品也再度大举侵入中国。除了印度、土耳其等国的鸦片每年仍有大量走私进入以外,日本等国还组织吗啡、海洛因等烈性毒品的走私。这样,尽管海关统计中的鸦片贸易已经消失,但实际上毒品的输入比昔日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如 1923 年,仅印度烟土入华就达 140 万磅,土耳其鸦片达 120 万磅,波斯土达 160 万磅。据伍连德的估计,1926 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为 40 吨,^①实际数字还远不止此。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,输入中国的鸦片、吗啡、海洛因等毒品折算成鸦片每年约达 10 万箱,即 500 万公斤。抗战结束后,外国鸦片的走私有所减少,但在上海等地,仍有大宗的毒品走私进入。外国毒品的输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停止。

六、中国近代种植罂粟面积、土烟产量和吸毒者的数量

近代中国政府没有作出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经济核算和统计,因此,近代中国国民经济发展、生产和流通、财政赋税诸方面统计资料的缺乏,是困扰史学工作者的一大难题。同样,也给本专题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。笔者在尽可能收集资料的基础上,对必须阐述清楚的三个基本问题作了初步的考证与估计。

第一,中国近代罂粟种植面积。罂粟的栽培,早在宋元时期就已出现了。但有规模的种植始于清嘉庆年间(1796—1820),到道光初年,已蔓延至广东、湖南、云南、四川、贵州、山西、陕西、甘肃、浙江、福建等省。鸦片战争后,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甘肃和陕西五省的罂粟种植面积已超过 100 万亩。19 世纪 60 年代,在一批士大夫以土烟抵制洋烟主张的倡导下,罂粟如原野烈火,从此几乎无省不栽,无地不有。到 19 世纪 80 年代,全国罂粟种植面积约为 1 330 万亩,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1.6%,进入了中国种植罂粟的第一个高潮。清末禁烟前,罂粟种植面积达 1 871 万亩,实际情况可能还不止此数。

1906 年清政府实行禁烟,各省厉行禁种,取得成效。据统计,1909 年时,鲁、晋、陕、闽、浙五省的罂粟栽种面积各为近百万亩,已减少 75%。种植面积最多的四川省也大大减少。但 1917 年后,各地军阀纷起,勒逼农民植烟,遂进入中国种植罂粟的第二个高潮。1925 年,罂粟地增至 1 800 万亩。以后在军阀混战的岁月里,种植亩数继续飞速上升。到 1929—1933 年间,全国植烟面积达到 8 000 万亩,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6.1%。产量最大的省份为四川、陕西、云南、甘肃。有些地区的罂粟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 80%—90%。甘肃省的罂粟收益,一度占

^① 《拒毒月刊》,第 24 期。

农业总产值的 90%。^① 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“罂粟王国”，以致一些外国人将罂粟花称之为中国的“国花”，国内也有人不无讽刺地建议定罂粟花为“国花”，因为确实没有一种花朵像它那样普遍地开放。

1935 年，国民政府实行“六年禁烟计划”，有步骤、分阶段地减种罂粟，从而使毒苗栽种面积有所下降。在四川省，种烟面积由 1935 年的 24 820 公顷减至 1937 年的 16 277 公顷。但自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日军占领区内的毒卉日趋扩大。国统区也远没达到 1939 年重庆政府宣布的全国罂粟“均已一律禁绝”，在川西、甘肃、云南边缘地带，罂粟面积还在扩大之中，全国的毒卉面积在 2 500 万亩以上。

抗日战争结束后，罂粟种植情况较为复杂。东北等地被中国共产党控制后，罂粟种植基本被铲除，随着解放区的迅速扩大，全国的罂粟种植面积也在缩小之中。但尽管如此，直到国民党失败、离开大陆为止，罂粟仍是最重要的农产品之一，种烟面积仍有 2 000 万亩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经过三年扎实细致的禁毒运动，罂粟才被彻底铲除了（见图 0-2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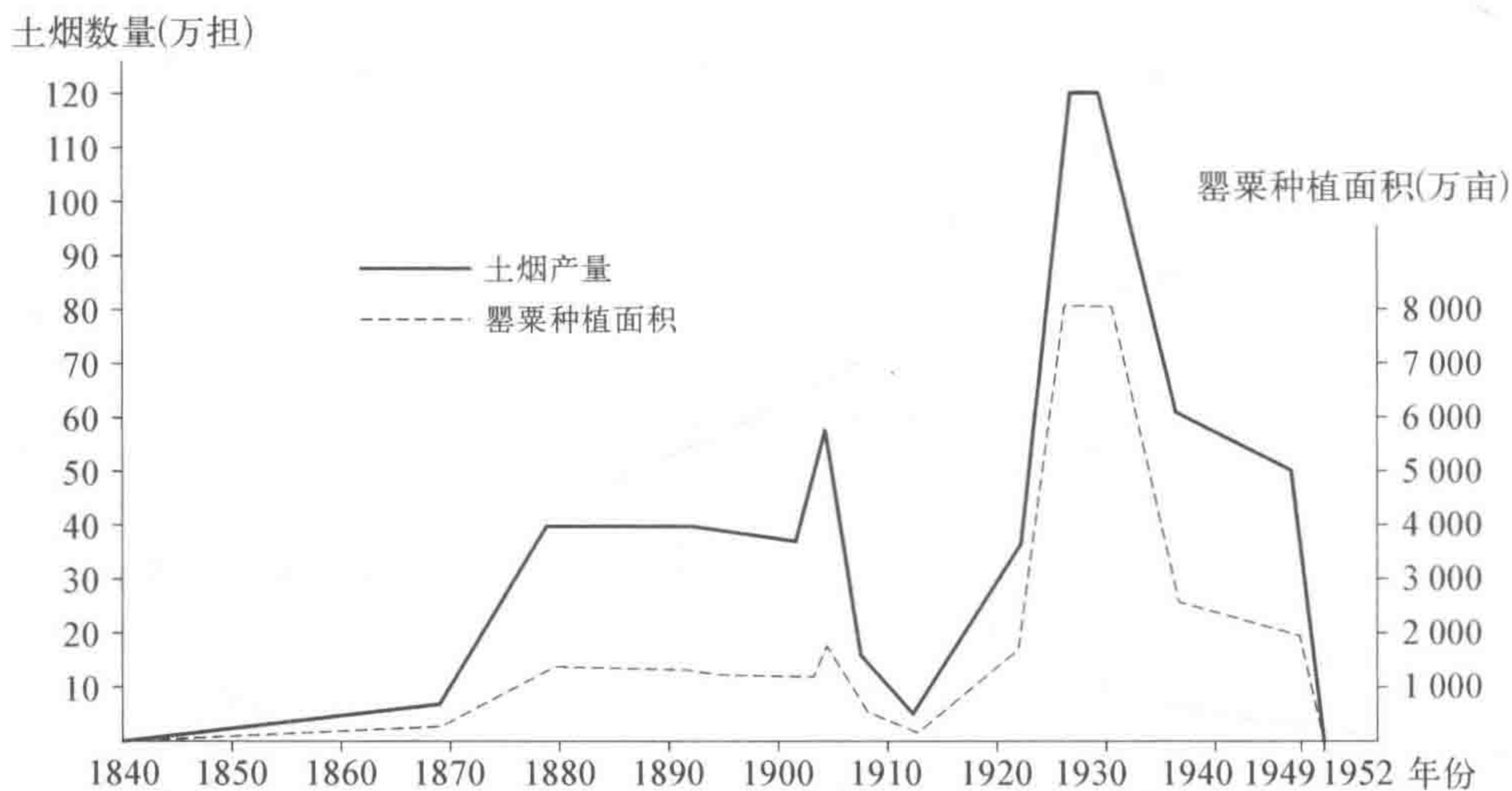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0-2 中国近代罂粟种植面积和土烟产量变化示意图

第二，中国近代自产鸦片的数量。自产鸦片又称土烟，是在罂粟种植扩大后增长起来的。在鸦片战争前夕，仅云南一省就已有数千担鸦片的产量。估计全国鸦片产量不会低于 5 000 海关担。鸦片战争后即增至 15 000 担。19 世纪 60 年代后随着罂粟种植面积的剧增，土烟产量也飞速提高。如四川一地，1869 年

^① 李文治：《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》，第 1 辑，三联书店 1957 年版，第 464 页。

土烟产量为7 500担,到1879年时已增至177 000担。全国土烟1866年为5.5万担左右,1870年达7.7万担,1880年总产量已达40万担,约为进口鸦片的4倍。1906年总产量为376 000担。清末民初,第二次禁烟运动发动后,鸦片产量大大下降,1910年时下降到15万担左右。民国初年的产量更少。但自1917年后,随着罌粟的蔓延,土烟产量呈直线上升。1925年时已恢复到清末1906年的产量水平。1929—1933年间,每年鸦片产量为120万海关担。这一数字超过当时世界各国鸦片产量的10倍。关于这一时期中国的鸦片总产量,中外研究者常引用四川禁烟当事人谢藻生的回忆。谢指出,在1917—1934年间,仅四川省每年的鸦片产量就达100万担。^① 笔者统计各县的产量,这一数字基本无误。但如果以高出全国平均数的每亩生产2公斤鸦片计,需要2 500万亩耕地;如果以全国平均数的每亩1.5公斤鸦片计,更需要3 330万亩耕地;而四川全省总耕地仅8 000万至9 000万亩。^② 问题的症结是数量单位“担”有误。民国防区时代,四川军阀各自为政。所用的“担”重量混乱,且远小于海关担(50公斤)。如涪陵、万县、奉节、开县等地一担为35公斤,丰都一担为39公斤,东乡县一担为37公斤,有些地方更少。^③ 因此,笔者估计四川省鸦片最高产量约为30万海关担,其植烟土地约为800万亩。而全国鸦片亩产最高为贵州荔波,达800两,该县产烟5万担。^④ 后一数字还不是最高的,在1930年前后,四川涪陵、丰都两地鸦片产量都曾达到10万担以上。

抗战前期,由于日军在占领区推行毒化政策,鸦片总产量约有40万担,再加上国统区边缘地区的鸦片,总计鸦片有60万担左右。1942年以后,产量有所下降。到1949年时,鸦片总产量仍有50.5万担之多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卓有成效的禁烟,才彻底铲除了烟毒(见图0-2)。

第三,近代中国吸毒人口估计。关于吸毒人口,尽管历史上留有一些材料。但一方面残缺不全,另一方面有些只计算吸鸦片者,而忽略了吸食吗啡、红丸、海洛因等毒品的人数。当然要精确作出统计是极其困难的,在此根据对各类资料的研究梳理,尽可能地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。

鸦片战争前,中国吸食鸦片的人口在200万人以上。19世纪50年代时已增至300万人。此后在日益增加的洋烟和土烟的双重熏染下,吸食鸦片的人数连续上升。到80年代,吸食洋烟土烟者约2 000万人,占全国人口的5%。这个

① 谢藻生:《昔忆四川烟祸》,《四川文史资料选辑》,第10辑。

② 许道夫编:《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,第8—9页。

③ 英税务司霍伯森著,李孝同译:《重庆海关1891年调查报告》。

④ 许达生:《苛捐杂税问题》,《中国经济》,第1卷,第5期。

数字到 1906 年前没有什么大的变化。清末禁烟后吸毒者有所减少。到辛亥革命后,约降至最低点。进入军阀混战时代后,土烟大增,再加上吗啡、海洛因等烈性毒品的大量进口,吸毒者再度剧增。1929—1934 年间,中央及地方不仅没有行之有效的禁烟措施,相反还鼓励种、贩、吸,从而使中国的毒祸达到空前地步,总计全国吸食各类毒品的人数不会少于 8 000 万人,占全国总人口的 16.8%。1935 年后,吸毒者略有减少。但抗战时期由于日军号召、纵容沦陷区民众吸毒,因此仅沦陷区的瘾君子就达 3 200 万人。加上国统区等地的吸毒者,人数显然仍超过 4 000 万。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,全国的吸毒者仍有 2 000 万人(见图 0-3)。经过三年的禁烟禁毒运动,这些人基本上戒除了毒瘾,吸毒阶层才从历史上消失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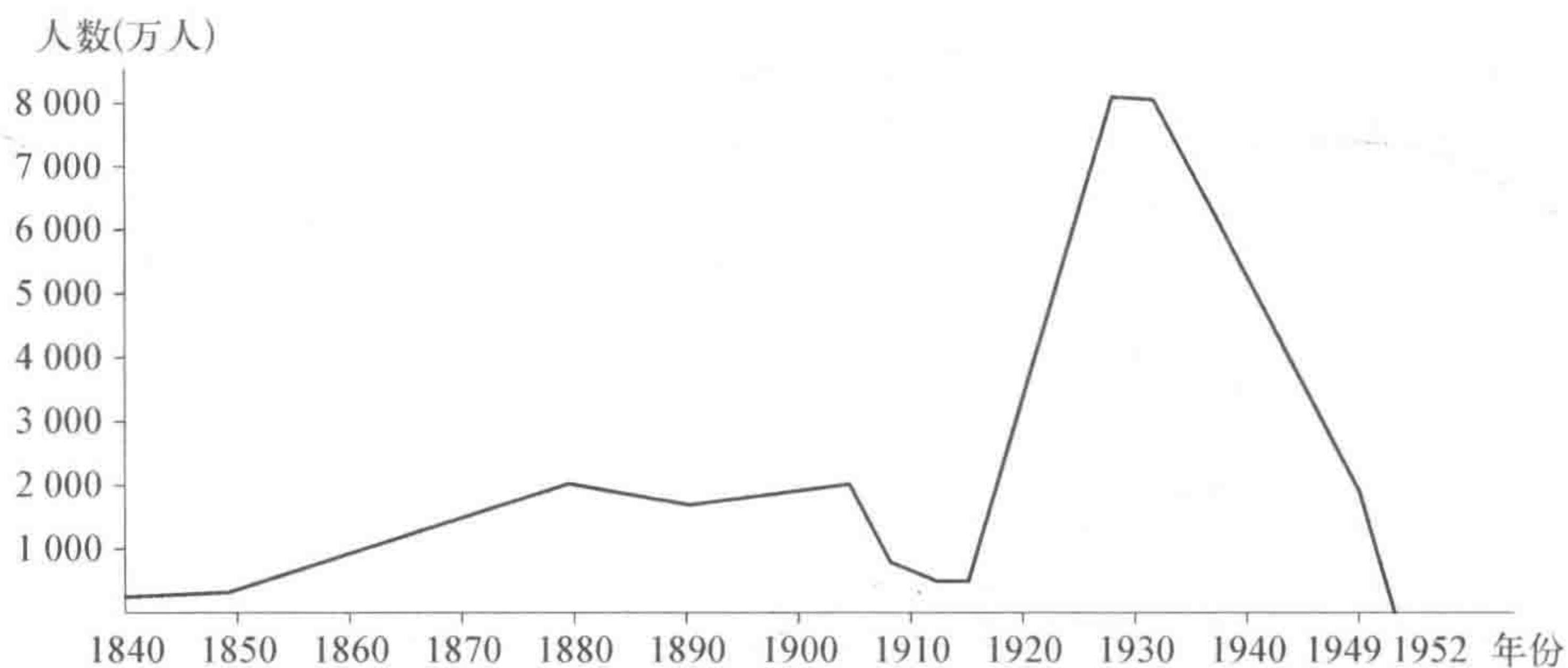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0-3 中国近代吸毒人数统计示意图

七、毒潮再起 扫毒正酣

展望全球,毒品的泛滥,目前已成为世界性公害。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,全球的毒品交易额高达 5 000 亿美元,仅次于世界军火交易。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,全球至少有 2 亿—3 亿人吸毒。在一些国家,贩毒集团至今仍在与政府展开贩毒与禁毒的旷日持久的战争。为解决日趋严重的毒品问题,1987 年 6 月,联合国麻醉品滥用与非法贩运问题会议确定每年的 6 月 26 日为国际反毒品日。1990 年 2 月,联合国召开首次反毒品大会,宣布 1991—2000 年为联合国禁毒年。1995 年,在纪念联合国成立 50 周年的大会上,禁毒再度成为各国首脑关注的焦点。

中国无毒国的称号保持了 30 年,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起,在国际毒潮的侵袭下,尤其是金三角贩毒集团实施毒品北上,建立“中国通道”后,毒品再度像瘟

疫一样在中华大地蔓延开来。

简言之,当代的毒品犯罪具有以下特点。一、毒品犯罪日益严重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,还主要是毒品的过境贩运问题,而到90年代初,国内种植、制造毒品日益扩大,出现“双向流通”。二、贩毒案件直线上升。1988年,中国公安机关查获的毒品犯罪案268起,到1992年已达69060起,4年中猛增至257倍。三、毒品种类由近代以鸦片为主,升级换代到以海洛因为主,吗啡、鸦片、大麻、精神类药物并举的情况,还出现了危害更大的“冰”、安非他明等新品种。四、贩毒地区不断扩大,20世纪90年代,波及全国700多个县市,到21世纪初,全国已难以寻找到未被毒品污染的净土。在有些地方形成地下贩运、批发、零售的供销网络。五、贩毒组织呈现日新月异的集团化、职业化、武装化和国际化趋势。

20余年来,中国政府为扫除毒患进行了不懈的努力。1981年,国务院就指示各地严厉打击贩毒犯罪;1991年,中国成立国家禁毒委员会,颁布《关于禁毒的决定》;2008年,《禁毒法》正式实施。各地公安、海关、边防和法院等部门在缉毒反毒战线,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。

但由于种种因素,毒品不但没有消灭,反而有扩大、泛滥的趋势。摆在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前的禁毒任务依然十分严峻。尽管1996年中国登记在册的吸毒者为100多万人,还不到总人口的千分之一,远低于鸦片战争前吸毒人口的比例;更比1929年时吸毒人口占总人口的16.8%要低得多。但是,毒品蔓延的迅速,吸毒者人数的急剧上升(见图0-4),毒品泛滥所引发的各种犯罪问题,昔日“东亚病夫”的耻辱,近代屡禁不止的教训,这一切都告诉我们,决不可掉以轻心。

一场关系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制服毒魔的斗争,正在展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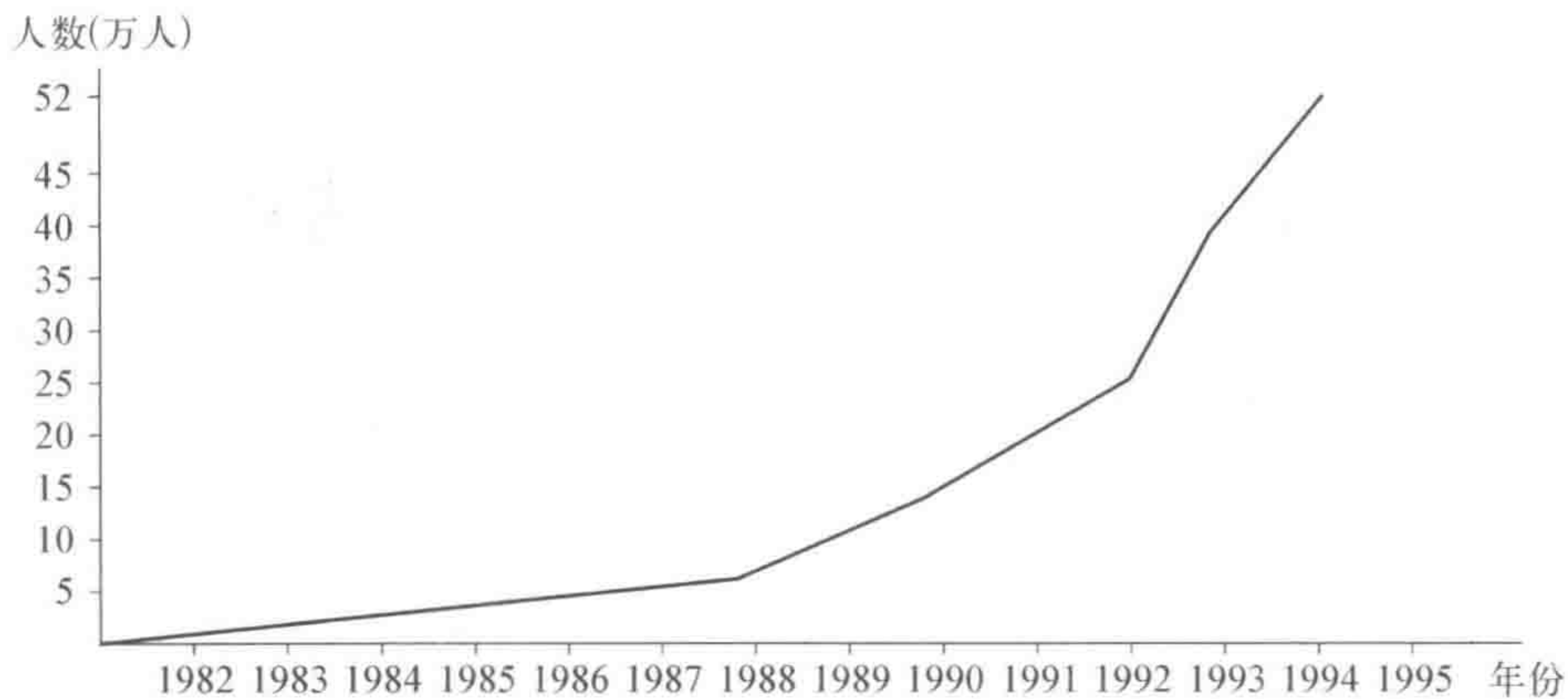


图0-4 1982—1995年中国吸毒人数示意图

资料来源:《人民日报》,1992年6月26日;1996年4月4日。原野:《大地狱》。

目 录

前言 / 1

第一章 毒品及其历史 / 1

第一节 毒品和毒品的种类 / 1

第二节 罂粟的世界种植史 / 13

第二章 鸦片在古代中国的流布 / 23

第一节 唐宋元时代的罂粟及其药用 / 23

第二节 明清时代的鸦片 / 27

第三章 罪恶的鸦片贸易 / 34

第一节 葡萄牙人对华输入鸦片时期 / 34

第二节 英国东印度公司时代 / 40

第三节 英国商人贩运鸦片时期 / 48

第四章 烟毒的泛滥与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 / 54

第一节 禁烟与贩烟 / 54

第二节 鸦片烟毒的泛滥及其后果 / 61

第三节 彪炳千秋的禁烟运动 / 73

第五章 悲壮的鸦片战争及鸦片贸易的合法化 / 83

第一节 改变历史的鸦片战争 / 83

第二节 战后鸦片走私的发展 / 88

第三节 鸦片贸易的合法化 / 94

CONTENTS

- 第六章 洋药进口的高峰与土烟的日趋发展 / 104
 - 第一节 上海时代 / 104
 - 第二节 外国鸦片的进一步泛滥 / 119
 - 第三节 黑风毒雾遍中华 / 126

- 第七章 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 / 142
 - 第一节 烟毒的进一步泛滥 / 142
 - 第二节 清代第二次禁烟运动 / 156
 - 第三节 民国初年的禁烟斗争 / 185

- 第八章 军阀与烟毒 / 202
 - 第一节 1917—1927 年的毒况 / 202
 - 第二节 1925 年：国内鸦片战争年 / 210
 - 第三节 上海法租界：中国第一毒窝 / 220
 - 第四节 民间禁烟运动的继续发展 / 227

- 第九章 南京国民政府“寓禁于征”政策下的毒品泛滥 / 233
 - 第一节 特业、特货、特税 / 233
 - 第二节 地方势力的烟政 / 245
 - 第三节 1927—1934 年：烟毒顶峰时期 / 254
 - 第四节 烟毒弥漫的西南 / 264

- 第十章 禁烟幌子下的毒品泛滥 / 272
 - 第一节 六年禁烟计划前期 / 272

目 录

- 第二节 禁烟内幕 / 288
- 第三节 日本侵华与毒品 / 297

- 第十一章 抗战时期的烟政 / 302**
 - 第一节 六年禁烟后期 / 302
 - 第二节 日军占领区的毒品泛滥 / 311
 - 第三节 国统区的鸦片 / 337

- 第十二章 解放战争时期的毒品与新中国的禁烟运动 / 343**
 - 第一节 战后国民政府的烟政 / 343
 - 第二节 国统区毒品的再度泛滥 / 349
 - 第三节 新中国的禁毒运动 / 353

- 第十三章 港台金三角的毒况 / 366**
 - 第一节 香港：世界毒品中转站 / 366
 - 第二节 台湾的毒况与戒毒 / 371
 - 第三节 毒品王国金三角 / 379

- 第十四章 当代中国的毒况和禁毒斗争 / 389**
 - 第一节 毒潮再兴 / 389
 - 第二节 禁毒斗争的展开 / 399